

一段难忘的经历

□梁田

我是中山大学体育系的学生，1949年春来到五桂山，所遇到的诸多事情及所受的教育真使我一生受用无穷。

在中大时，我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。1949年5月，地下学联安排我到中山游击队。我撤出广州后，是先到香港，再由香港转到中山的。联系暗号是“一帆”。当时香港的住宿十分困难，只有投亲靠友。我找到舅舅家，向舅舅说我快大学毕业了，是来香港找工作的。一天上午，“一帆”通知我下午就出发。由于时间紧迫，还没来得及等舅舅下班回家向他道别就走了，以后又一直没法给他音信，使他很不高兴。舅舅是不明白个中原因的，因此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近人情，找到工作也不用这么急着走，应该向他道别才走。最遗憾的还是一直到他离开人世，我还没机会亲自向他道歉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从香港乘船到了澳门，到澳门后住在海边渔村一茅棚里。在一个黑夜里，钟大叔带领我们7名知识子上了一艘渔船，这时我已换上一套唐装黑衣裤，打扮得像渔民那样。我们藏身的地方原是个盛活鱼的鱼舱，7个人塞在那里，空气又不好，很是难受。特别是过检查站时，渔船上的渔民特别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动，要镇静，更不能说话。当检查站的国民党兵问渔民舱里装的都是什么？我们在舱里也隐约听到渔民的回答：“里面盛的都是鱼。”既心慌，又想笑，但又不能笑。后来渔民递了一包塞满了钱的“烟”给检查的人疏通疏通，我们的渔船才过了这一关，又能开航前进。快到天亮时，我们到达中山县的凤凰山。在凤凰山接我们的是容文达。见面时，钟大叔说：“将7瓶墨水交给你啦！”这时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代号是“墨水”。

我们跟着容文达走了一整天山路。天色渐晚，我们经过一道国民党的封锁线，容文达机智地带领我们抄小路安全通过了。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，从未走过这么远的山路，累得够呛，容文达就沿途教我们唱歌。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《达坂城的姑娘》，这是有名的民族作曲家王洛宾的名作。此民歌十分流行，容文达教我们的，是填上了新的革命歌词的，过了半个多世纪，我仍记忆犹新。歌词是：“五桂山的同志，枪法准啊！饼干（用饼干罐制作的土地雷）大又硬啊，个度（那里）有个敌人又蠢又笨呀，两个眼睛合眼训（打瞌睡）呀！佢哋（他们）要‘扫荡’，我哋个的（我们那些）好汉，一定要佢瓜老衬（他见阎王）呀！带埋（着）佢的机枪，带埋佢的子弹来投降送给我们。”这个民歌变成鼓舞我们革命士气的歌曲。一路上容文达还跟我们讲述很多当地革命斗争的故事，使我们都忘却了疲劳，拼命地跟他走。入夜，我们在一村民家吃晚饭。我满以为今晚就在这里住宿了，岂料晚饭后休息一会，容文达又领着我们这7个已经十分疲乏的知识分子继续赶路。漆黑中我们走进了一个山坳，在这隐蔽的地方，有一个小草棚，正好能容下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就挤在那里过了一夜。虽然条件很差，又闷又热，因为走了一天山路，实在太累了，大家都睡得很熟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再走了不很长的山路，就到达崧埔村中山特派室所在地。在这里经过学习，我和李成留在南京队当文化教员，其余的分回白区去开展群众工作。

南京队是中山特派室的警卫连，我们的驻地是一户较大的华侨房子。房主只有一老一少，都是女的，其他人都在海外。房子空余的地方较多，房子的2楼铺了地板。我们到南京队的第一天晚上，队长缪显（连长）就领我和李成到2楼的一个房间去睡觉。房子是空空的，除了地板什么也没有。我最初感到很奇怪，心想：“怎么没有床铺？怎么睡？”其实，这木地板已是这里最高级的睡床了，在游击队里，这算是条件最好的了。这还是在没有发生什么的情况下，才能安稳地在这硬地板上睡上一个好觉，假如有情况（敌人有活动），就要半夜上山（在山上居高临下，打起仗来有利），在山地上铺上蓑衣来睡。为避免露水打湿脸，就用竹笠盖着头部。有些山头有水泥地的坟墓，就照顾特派室的领导及女同志，因水泥地平滑又

没泥地那么潮湿，我们竟乐观地称这些坟墓是宾馆。同志们还常和我开玩笑，问我夜夜与鬼睡，怕不怕？我们是唯物主义者，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，有什么可怕呢？

我们在城里喝的都是开水，可在游击队是喝不上开水的，只能喝山坑里未煮过的坑水。开始还是怕喝了生病的，经过思想斗争，心想同志们都是这样喝了，别人能适应，我也应该适应。喝水这一关也算过了。

夜里走路的关是怎么过的呢？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，武工队基本上是夜行军。漆黑中不准打电筒，怕有光会暴露。怎么走？老同志凭经验教导我们：“黑泥白石光是水”，这是他们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我就跟着实践。实在太黑了，就每人臂上扎上一白毛巾，隐约跟随着前面的白点前进。渐渐地开始适应了，就越来越少摔跤或是踩得满脚是水了。

在部队里，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事事都感到新鲜，最大的锻炼要算是打仗了。我是文化教员，不算是战斗员，但遇到战斗时，也得随队伍到战场，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因此受的教育实在不少。

一次战斗是在凌晨，敌人在一山头，我们在另一山头。我们在山顶下不好走的路上前进。我因缺乏军事常识，觉得山顶有较平整好走的路，竟自作聪明地爬上山顶的好路走，刚上到顶上，敌人的子弹就打过来，同志们赶快将我拉下来，并警告我，这是最危险的，这是给了敌人作为攻击的靶子，且暴露了整个队伍的行动。山顶的好路是叫山的“陵线顶”，在战斗中是上不得的。这真是给我上了极深刻的一课。

一次，我们整个南京队和特派室的同志被敌人围困在一个与地面成 70 度很陡的山头上，一整天没东西下肚，饿极了。黄昏，村民冒险将饭挑上山头，我们手上只有枪和子弹等武器，什么碗筷、匙勺等吃饭用的东西根本没有，只得用手将白米饭捏成饭团，像吃馒头那样将饭团咬来吃，以充实肚子，更说不上有什么菜了，真有意思。

崖口战斗这一仗，华炳、炳添牺牲了，张炳也受了伤。在战斗前一天，炳添在行军时不小心被树枝勾破了裤子，他要我替他补，当天我将裤子补好还未来得及送还给他，第二天的战斗，他就牺牲了。战斗就是这样残酷的。

马溪战斗中麦红军和芝麻康受了伤，都是伤了脚，走不了。麦红军个子中等，芝麻康却是个大个子，因他个子特大，倒反叫他芝麻。他们由卫生院许裳、事务长及我 3 人轮流背着撤退。那时走的是山路，崎岖不平，还要穿田径过水沟，因为情况危急，背着一百几十斤的大个子，我们 3 个人即使累极了也不敢歇一歇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：只要我能安全撤离，伤员也一定能安全撤离。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，我产生了平时极难产生的力量，完成了背伤员撤出战场转移到安全地方的任务。当听到村民说“细佬女（当时我的绰号）这里安全了”的时候，我再也背不动了。此时的我，满身都沾满了伤员的血。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段经历。

解放后，我搞回我的专业体育。在和平年代里，也遇到不少困难，但想起游击队里的生活，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。游击队这段经历对我打下深深的烙印，真是一生受用无穷。

（选自《中山党史》2004 年第 2 期）